

谢家极：从中大学子到南大教师

谢家极老师 1949 年 8 月毕业于国立南京大学生物系，兜兜转转又回到南京大学任教。青春时光，南大陪她读过，而此后，她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母校。

谢老师与南大的情缘从学生时代就开始了，高考时，她报考了南京大学，说起原因，她回忆道“那时候还是中央大学，规模大，名声大，又是最高学府，所以高中一毕业，我就立即报考了重庆，一点都没有多考虑。”

进入中大后，谢家极在重庆的柏溪分校念书。谢老师回忆说，嘉陵江边有一片开阔的田地，学校便沿着这个开阔地带搭建了草棚、竹篱笆，抹了泥和石灰，构建成了他们的简易教室，谢老师就读的生物系的实验室就在一个草棚房子内。当年，谢老师和同学们就在这个草棚中做实验、看显微镜、观察细胞。

学校不仅教室小、实验室小，图书馆也很小。谢老师说，那时他们每天下午都要去图书馆内抢座位。那时发电机的电量不足，灯光很弱，很多同学在图书馆抢不到座位，会自己在宿舍用油灯、蜡烛看书，第二天早上起来，就会发现很多同学的鼻孔上黑乎乎的，那是前一夜用了蜡烛的痕迹。

学习条件如此，生活条件自不必说，谢老师介绍道，当时他们一百多名女同学统一住在一个大统仓内，十个人一小间，睡的是双人木床。而饮食自然也不是很好，谢老师说他们吃的都是“八宝饭”，里面的“宝”主要是指沙子和老鼠屎。即使这样，饭还是不够吃，抢不到饭的

女同学就吃不饱，有时会结伴下山买点麦芽糖、花生米做零食，买这两样也是因为这两样东西比较便宜。

有感于这样的学习条件，有位高年级的同学在过年时写了这样一副对联挂在墙上，上联是：“想当初，初来兮，也曾经，油头粉面少年英俊”，下联是：“到如今，将去也，只落得沙眼胃病老气横秋”。

尽管生活非常艰苦，但谢老师还是感到很幸福，她说，能够考上中大，能够在柏溪学习，她觉得很开心。

当然，迁回南京后，同学们的学习条件就好了很多，生物系有了专门的教室和实验室。

谢老师在上学期期间参加了很多次运动，在 1949 年的一次运动中，她还受了伤。那是 1949 年 4 月 1 日，解放军已经准备要渡江了，当时蒋介石已经下野，李宗仁宣称要去北京和谈，但他“假和谈真备战”的阴谋被同学们识破了。

南京的各大高校组织了四千多人一同游行。谢老师回忆道，那天她回到学校，刚吃过饭就听到了敲锣的声音，说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的同学回校的时候被警察打伤了，被从卡车上拖下来用棍棒打。

听到这个消息，同学们立刻组织队伍包围总统府，中大的同学在总统府门口围了一个圈，要求释放被捕的同学。

下午两点左右，一辆载着军警的卡车向同学们驶来，军警们拿着棍棒开始追打学生，谢老师自己就被打了一棍。有三个人在这次游行牺牲：一位是政治大学的司机，叫陈祝三；还有两位是中

大的学生——程履绎和成貽宾。

陈祝三被当场暴打，后被拖到了一条阴沟里，活活闷死；成貽宾受重伤，腿骨折，因伤势过重，医治无效，于 4 月 19 日逝世；程履绎伤势也很重，头上有很长的裂口，在游行的第二天逝世，而那时他刚刚完婚。

谢老师回忆说，那时国民党败退了，南京处于真空，到处都是强盗，之后是共产党提出要保护学校、要复校。1949 年 4 月，南京解放。同年 8 月 8 日，国立中央大学更名为国立南京大学。

1949 年，谢家极从国立南京大学毕业。那年六月，她被抽调至青年团南京市工委建团工作队帮助建团，之后被分配到南京市三中，做政治老师兼少先队辅导员。

后来谢家极在团市委工作了五年多，1957 年，她回到了南京大学工作，之后担任了大气科学学院的总支书记与党委书记。

谈及对共产党的接触，谢老师说，她从小就敬佩共产党，她的父亲就是一

位中共地下党。她回忆说，她的父亲因为参加革命斗争，经常不在家，她对父亲的记忆大多来自亲友讲述的父亲的英勇事迹，这样的记忆让她觉得共产党员都像她父亲一般勇敢、机智、爱国。

同时，在学生运动中她也慢慢感受到了共产党的好，她说，在青年会歌咏队中，她接触了一些进步同学与进步书籍，这些经历让她感到共产党治理中国是有希望的。在南大工作的这些年，也让谢老师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判断。

谢老师的一生都与南大紧密相关，从她的经历我们不仅能看到那个时期南大的历史，也能够了解到那一代人的精神面貌。

(采访/陈志聪 王璟 王聪 孙荻；
整理/韦君宇)



姜平：“作为一个共产党员，我感到自己有责任”

1929 年 9 月 5 日，姜平教授出生于江苏省高邮县三垛镇的一个贫苦知识分子家庭，父亲教私塾，也行过医。只是在那个年代，清贫的日子也很难持久，内忧外患接踵而至。1936 年父亲病逝，第二年全面抗战爆发，三垛镇先是遭日军轰炸，后又遭日军占领。日本兵到处烧杀抢掠，母亲只能带着几个年幼的孩子四处逃难。姜平在艰难的生活中受尽各种折磨成长到 20 岁。

1949 年 3 月初，姜平冲破国民党军队的“封江”，从江南到达刚刚获得解放的扬州，进入华中大学第二工学团，走上了革命道路。同年，随解放大军渡过长江到苏南新解放区工作，从事过工人运动，组织过农会，担任过土改工作组组长。后又调任县人民法院的审判员、庭长。1955 年又担任了镇江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的副庭长。

1952 年姜平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从此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的事业努力工作，成为他终生的追求。

1956 年春天，党中央召开全国知识分子工作会议，提出了“尊重知识，尊重人才”的口号，并发出了青年干部应该“向科学进军”的号召。在工作中，姜

平深感自己读书太少，文化水平难以适应工作需要，于是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，决心报考南京大学历史系。“法院领导劝我报考华东政法学院，想让我毕业后返回中级法院工作，并暗示给我提升职位。但我知道南京大学是个和北大、清华、复旦齐名的历史悠久的大学，有很多国内外著名的教授学者，为国家培养了大批高质量人才，所以我谢绝了法院领导的好意。”

“进南大的时候我有一个想法，就是要研究中国革命史。”提到这里，姜平眼中一亮，“为什么要研究中国革命史呢？因为 1945 年，我亲身经历了家乡的解放，看到了新四军纪律严明，处处关爱人民，共产党派来大批干部发动人民组织起工会、农会、妇女会等，领导他们开展各种翻身解放活动，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。那时候共产党力量毕竟小，1946 年国民党大军打过来之后，新四军打了几仗后就北撤了。但是只过了三年时间，我的家乡又全部都解放了，到 1949 年底全国也都基本解放了！了不起啊，这是翻天覆地的大变化！这里面是什么道理呢？为什么共产党能取得这样快这样大的胜利？所以我一心一意地想要研究中国革命史。”

进南大报到之后，校党委组织部长

找姜平谈话，提醒他考进南大，不要只想到读书，忘记了自己是共产党员，还要为党工作，并派他担任了学生党支部书记，他欣然接受。一边工作一边学习，让姜平的求学之路非常艰苦。当时他家庭经济上也非常困难，每月只享受调干助学金 24 元，爱人工资也不高，已有两个孩子，因此生活非常艰苦。但作为一个党支部书记，他为好多个同学申请过困难补助，自己却从来没有申请过。“领导关心我，我也不讲我的困难。我是共产党员，应该严格要求自己，像我这样的党员不止我一个。那时共产党员很自觉，党风好，党的威信高。我们全班 70 多个人，90% 以上都是调干生，党员人数很少，大多数没入党的调干生也积极向党靠拢，响应党的号召，争取入党。”姜平在南大历史系读书时，该系是第一次从四年制改为五年制，他本应该五年毕业，1960 年秋学完了四年课程，被组织上调去任“预备教师”。1961 年姜平与全年级同学一起毕业，留在历史系成为正式教师。

在姜老的经历中，令我们印象最深的一点，是他在十年动乱时期的表现。他始终秉持着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和正直的史学工作者的立场，“所有造反派的活动我一律不参加”，而是坚持独立思考，坚持读书，密切关切着形势的发展。1975 年，“四人帮”发动所谓“批邓”和“反击右倾翻案风”运动，1976 年 1 月 8 日周恩来总理病逝后，“四人帮”竭力阻挠全国人民悼念周总理，而且趁机将“批邓”运动突然升级，妄图打倒所有老革命家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党政军大权。姜平感觉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时刻。“作为一个共产党员，我感到自己有责任。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，我决心要以南京雨花台邓中夏烈士不怕杀头的革命精神为榜样，与野心家、阴谋家进行坚决的斗争。”于是，在 1976 年 1 月 18 日和 2 月 22 日，他冒着生命危险，以“一

个共产党员”的名义先后两次向老革命家叶剑英、邓小平秘密上书，请求他们“采取果断措施”，“除掉张春桥等一伙，挽救党和国家的命运”。结果两封信都落入了“四人帮”控制的公安部门手中，并定为“6118”重大“现行反革命”案件，在南京地区全面排查。“所幸由于我校广大师生的保护，查了 8 个月未能查出，同年 10 月党中央一举粉碎‘四人帮’后，公安部门宣布该案件撤销，并承认这是一个‘革命行动’，我才幸免于难，并受到了匡亚明校长、章德书记和历史系党组织一再表扬和鼓励，南京市委办的《党的生活》和省党史工委办的《世界风采》也发表文章赞扬我的行动。为感谢各级党组织、校领导、南大师生对我的保护、关心和鼓励，此后我更积极地投入到了教学、科研与促进党的改革的工作里。”

尽管已年近九旬，姜平对当前形势依然非常关心。说到十八大以来的成就，姜教授非常高兴，他激动地说：“全面深化改革只有几年时间，习近平就把中国大变样了，打倒了多少贪官啊！”“改革的难度很大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比原来改革的难度还要大。”“我们经过几年的改革，不仅全国社会更加稳定，并且各方面的改革都取得显著成效，正在向民族复兴、振兴中华的路上走！”

姜教授十分敬佩习近平的胆略和才能，他说：“习近平的气魄很大，眼界很开阔，目标很远大，不但要振兴中华，还要引领世界。”习近平提出的新思想、新理念已经在全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。

说到振兴中华，姜教授以坚定的信心说道：“我们沿着这条不断深化改革的道路走下去，只要不发生意外，我们国家再经过一二十年、二三十年的改革发展，在振兴中华的事业上一定可以取得更大的胜利，更大的成功，更大的辉煌！我有这个信心。”

(采访/丁述银 孟丽媛 王雪莹 丁丽茹)

